



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解构主义视阈下的文化翻译研究

——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高玉兰
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本书获淮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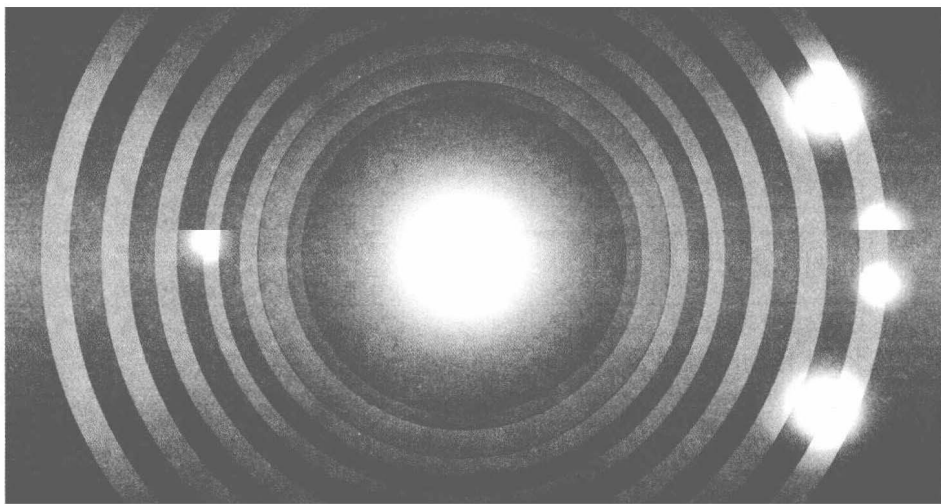
CULTURAL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解构主义视阈下的文化翻译研究

—— 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高玉兰 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将解构主义作为理论支撑、将文化翻译置于中西思维差异的视野下进行研究,扩展了译者在文化翻译中作为传送文化的主体研究范围。同时,本书探讨了译本差异的原因,从对两个译本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中享有的自主性以及译本多样的必然性。

作者从中西思维差异的视角,借助解构主义翻译观,通过对《红楼梦》中具体文化翻译文本的分析,论述了译者在处理文化因素中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并探索了《红楼梦》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和翻译。本书重点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译文语言的延异和历时、读者的历时性解读对文化翻译及其策略选择的影响和制约。本书同时提出,翻译策略的多样性决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

本书可以作为英语翻译专业学生、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从事翻译工作的社会人士及广大的翻译爱好者的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构主义视阈下的文化翻译研究: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高玉兰著.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3. 1

ISBN 978-7-312-03118-2

I. 解… II. 高… III. 文化—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7925 号

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230026

<http://press.ustc.edu.cn>

印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张 8.5

字数 166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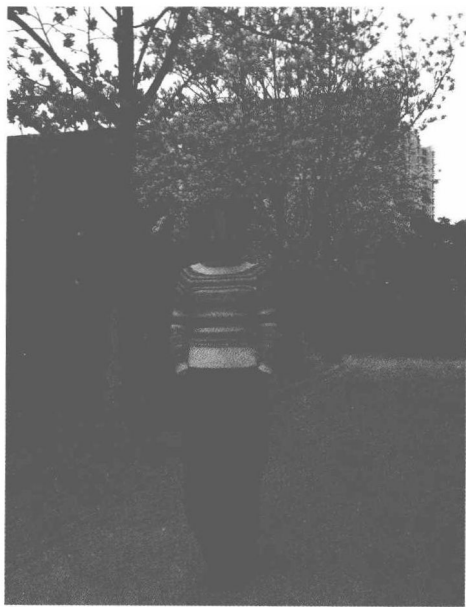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作者简介

高玉兰,博士、教授。现任淮北师范大学外语教育学院书记兼教学院长,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评审专家,安徽省外文学会理事。先后被评为安徽省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安徽省优秀女教工,多次荣获淮北师范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高玉兰教授二十多年来一直从事语言学、翻译理论及大学英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淮北师范大学外语学科建设的带头人,引领学科的发展。近年来,在《中国教育学刊》、《中国高教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编写“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十一五”安徽省规划教材各一套。先后主持完成十多项省级、国家级科研项目,连续三次获安徽省教学成果奖。



前 言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一种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文化的综合性活动,因此对翻译问题的研究不能采取单一、片面的视角,而应当从全面、整体的角度去审视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文化转向,以及90年代末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将文化与翻译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已成为一种互动转向的关系。文化翻译不再把翻译仅仅看成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或是一种单纯的两种语言文本的交互,而是把翻译放在一个大文化的视野里予以探讨和研究。

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解构主义否定西方传统的罗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结构主义,主张建立多元的、开放的体制,改变传统的固有模式;另外,解构主义翻译观在译学中打破了一元中心的思维模式,强调一个作品可以有多个译本、译文不必拘泥于原文的意义、译作具有相对于原作的独立性、译者应充分发挥创造性并且享有与原文作者同样的身份和地位,在对文本的阅读和翻译过程中重要的是求异而不是求同。解构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阅读过程的开放性,但文化翻译研究不能只看到解构主义颠覆、拆解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解构之后的建构。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从解构主义的哲学起源入手,通过对德里达译论的解析以及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分析,比较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与传统译论的异同,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这一理论对翻译研究,尤其是文化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影响。解构中蕴涵着文本的创新,翻译赋予原文生命,延异暗含人的主体性。本书通过解构主义的视角对文化翻译进行研究,从具体的文本出发,运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解构文化翻译问题。

文化翻译是将一种文化向别种文化译介的过程,包括对原文中特有文化因素的翻译,以达到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对话。本书从解构主义的视角研究文化翻译,对文化翻译进行解构,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语料、以中西思维差异对比为手段,揭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对翻译的制约,研究译者及各种文化现象,尤其是从对称谓语和家族文化词的处理上总结译者的文化翻译策略。通过具体语料分析,说明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存在的必然性,解构各译本因不同的翻译策略而表现

出来的译者的主体性、译本的开放性,揭示了文化翻译存在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作者从中西方思维差异角度,梳理中西方文化、哲学、价值观的差异,以及对翻译的影响,探讨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不同时期的译者可以根据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选择适合的翻译策略。

本书由六部分组成,包括绪论、正文四个章节和结语。正文四个章节内容分别为:第一章文化翻译与中西文化差异,第二章解构主义翻译观与文化翻译的解构,第三章《红楼梦》英译本的文化翻译解构,第四章《红楼梦》英译本文化翻译语料对比,各章构成互为联系和支撑的整体。

本书的特色体现在通过对《红楼梦》中具体文化翻译文本的分析,从历时和文化角度研究翻译中译者和读者的文化取向、社会环境、思维差异和翻译策略。本书对杨译和霍译的《红楼梦》中的文化翻译进行历时性地解构,两个译本都是解构主义“语义开放”理论的具体体现。通过两译本的对比分析,论述了译者在处理文化因素中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探索《红楼梦》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和翻译。重点是体现译者的主体性、译文语言的延异和历时、读者的历时性解读对文化翻译及其策略选择的影响和制约。

本书的特色还体现在采用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选择了《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从中收集语料,对论文的观点进行证明。通过对比分析《红楼梦》两部英译本中的文化用语,特别是称谓语翻译的差异,可以发现杨译本更倾向于向读者传达中国的民族文化,在译文中多用直译;而霍译本则倾向于同化这种称谓文化,以译语读者熟悉的称谓进行翻译。

编著者

2012年6月

目 录

前言	(i)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现状	(1)
第二节 研究角度与方法	(2)
第三节 本书的结构及创新点	(3)
第一章 文化翻译与中西文化差异	(6)
第一节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6)
第二节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8)
第三节 文化翻译研究	(9)
第四节 中西文化差异与文化翻译	(11)
第五节 中西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22)
第六节 小结	(29)
第二章 解构主义翻译观与文化翻译的解构	(30)
第一节 解构主义理论	(30)
第二节 解构主义翻译观	(33)
第三节 文化翻译的解构	(36)
第四节 小结	(53)
第三章 《红楼梦》英译本的文化翻译解构	(55)
第一节 《红楼梦》英译本译者的文化翻译对比	(55)
第二节 《红楼梦》英译本读者的接受性对比	(62)
第三节 《红楼梦》英译本中文化翻译的解构	(67)
第四节 小结	(83)
第四章 《红楼梦》英译本文化翻译语料对比	(84)
第一节 译本语料解构及文化翻译策略	(84)
第二节 英译本的文化翻译策略及读者定位对比	(87)
第三节 《红楼梦》英译本文化翻译特点词的量化分析	(89)

第四节	英译本的语料库数据对比	(93)
第五节	英译本中称谓语语料对比	(95)
第六节	小结	(117)
结 语		(118)
第一节	研究回顾	(118)
第二节	研究意义	(119)
第三节	研究特色及结论	(119)
第四节	研究不足	(120)
参考文献		(121)
后 记		(128)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现状

一、研究目的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语言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因此,文化的差异必然反映在语言上。文化的传递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和制约,不同译者的选择是不同的。有的译者倾向于译文向目的语文化贴近,有的则倾向于向源语文化贴近;有的倾向于原文的表达,而有的注重表达的自由。本书从解构主义视角和不同译本文化翻译策略的差异出发,说明中西方思维差异导致的译者主体性差异、译者的文化策略差异和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从而为文化翻译提供可鉴之策。

二、研究现状

文化翻译的研究已取得相当多的成果,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内外从文化的角度探讨翻译,为翻译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阈。西方一些著名的翻译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当代文化理论(如多元系统理论、文学解释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等)对翻译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翻译学者又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使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表现出跨学科性和全球性特点。

近年来,更多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翻译,指出翻译对促进文化交流至关重要,推出了一批跨文化翻译策略的专著,例如 Basil Hatim 的《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篇章语言学》,Eugene A. Nida 的《语言与文化:翻译中的语境》,David Katan 的《文化翻译:笔译、口译及中介入门》,Andre Lefevere 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国内一些学者也推出了一批和文化翻译相关的专著,例如郭建中的《文化与翻译》、包惠南的《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金惠康的《跨文化交际翻译》、刘

宓庆的《文化翻译论纲》、王秉钦的《文化翻译学》以及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等。

文化翻译的研究论文也大量涌现,据笔者搜索,自1999年至2008年4月,中国期刊网上公开发表的和文化翻译有关的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多达303篇,博士论文26篇,硕士论文480篇。

综观国内文化翻译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集中在引进西方学者的观点上,将各种文化理论与翻译理论相结合,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入手或论述文化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或分析影响文化翻译策略的因素,或是从译本比较入手,对比具体的文化策略。

本书从解构主义角度,以《红楼梦》的两个英文译本为例,从中西方思维差异切入,聚焦于文化翻译策略,分析比较文化差异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第二节 研究角度与方法

一、研究角度

本书从解构主义的视角观照文化翻译、研究译者的创造性与主体性问题。解构中蕴涵着文本的创新,翻译赋予原文生命,“延异”暗含人的主体性。例如洪涛用解构主义的方法和观点分析具体的译本——《“红楼梦”译评与期望规范、解构主义翻译观——以 Nibbansday 为中心》考证了《红楼梦》中“腊八”一词英译“Nibbansday”的文化渊源,通过解构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了翻译批评,说明霍译《红楼梦》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该论文从具体的文本出发,运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分析具体问题。

根据这一思路,本书讨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对文化翻译的影响,指出无论是关系到文本的客体论,还是关系到译者的主体论,德里达的理论均提供了新的视角,使得文化翻译策略多样化,译者的主体性得以显现。鉴于此,本书采用宏观阐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为依托,从宏观上阐述解构主义对于文化翻译研究的启示,然后通过《红楼梦》的文本分析,从微观上观察解构主义在文化翻译策略中的具体体现。本书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分析,从解构主义译学的主体论即译者的角度出发,讨论译者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所应承担的任务和使命,说明解构主义视野下的译者应该尽量体现原文和译文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差异,最终合理地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

其次,本书从中西方思维差异角度,梳理中西方文化、哲学、价值观的差异,以

及对翻译的影响,探讨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文化间的关系,指的是一种文化在同另一种文化交往时所处的相对地位。文化间关系的不断变动,意味着不同时期的译者可以根据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选择自己认为适合的翻译策略。

翻译活动涉及文本、译者、读者三个方面。读者的各种反馈是建立在译者应用翻译策略后做出的翻译选择上,因此译者的地位非常重要。读者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检验着译者做出的翻译选择。此外,文本的很多因素在文化框架下影响着读者的预期和接受,所以本书对读者和文本的因素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本书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为例,说明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存在的必然性,并通过分析,展示各译本因不同的翻译策略而表现出来的译者的主体性,揭示了文化翻译存在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二、研究方法

本书在研究中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中西文化翻译不同阶段的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翻译的策略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本书结合解构主义理论,对文化翻译过程中影响策略选择的各种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从理论上阐述文化翻译策略的理论基础。随后对相关语料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期通过实例证明文化差异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和译者风格的影响。

本书以随机抽取的体现文化差异的称谓文化词和家族文化词为分析对象,分析并比较了处于不同文化层面的文化词在不同译者笔下的翻译策略。以定量分析的方式揭示了不同译者在各自文化处理上的倾向,并揭示各译本之间的差异和互补。

第三节 本书的结构及创新点

一、本书的结构

本书主要以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语料,以中西思维差异对比为手段,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揭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对翻译的制约,研究译者对各种文化现象,尤其是对文化词的处理上总结译者的文化翻译策略。《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它的译介对文化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为文化翻译

的研究提供了语料。全书由六个部分组成,包括绪论、四个章节和结语。

绪论介绍本书研究的目的和现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本书的结构和创新点。

本书第一章首先对文化翻译的定义进行了回顾,对文化翻译的诸多现有定义进行了分析研究,介绍了文化翻译研究现状,对文化翻译研究作了述评。通过对中西哲学思想、价值观念、思维范示的对比,分析文化差异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中西方思维和文化差异的对比,说明不同译者各自独特的文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从文化本身的特性、文化之间的关系方面探讨了文化翻译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具体的文化环境通过译者对翻译策略选择产生的影响。文化因素的翻译是所有需要与其他文化交往的文化需要面临的问题,而文化的差异会直接影响译者的理解和策略的选择,因此这一章主要围绕文化与翻译进行了阐述。

本书第二章阐述了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翻译观以及对翻译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解构主义翻译观就是受解构主义指导与影响的翻译观点,解构主义翻译观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二是为一些违反传统翻译原则的翻译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为翻译和译者的主体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解构主义理论家认为文本没有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意义,可以对文本做出多种解释,把对文本的解释权交给了读者。对于翻译者而言,解释权就交给了译者。通过对比传统翻译观与解构主义翻译观,分析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和解释力。

本章着重对文化翻译中译者、文本和读者进行解构。文化翻译是译者翻译动机的产物,是译者主体性及其文化操作共同作用下的最终产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文化能力、文化态度、翻译目的、审美情趣等,但同时又能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和手段去顺应这些制约因素,为自己的翻译实践服务,并完成翻译的全过程及其实现翻译的目的。

本书从翻译活动的三个主要因素——文本、译者和读者的角度,分析译者的文化取向和风格、译文的文化特征和变迁、读者的审美和接受,分析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存在的必然性,同时对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译者的主体性进行了解构。

本书第三章以《红楼梦》的两个英文译本为例,对比不同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立场和社会环境,对比不同读者的阅读目的、接受层次和文化背景,同时对《红楼梦》英译本中称谓文化、家族文化的差异进行解构。文化翻译策略选择的不同,带来的策略多样性,不仅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而且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本书对译本的翻译策略使用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因文化翻译策略不同而产生的译文差异性和多样性。

本书第四章采用了语料库分析方法,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具有典型文化

特色的称谓语进行研究,通过对其中的亲属称谓、非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进行详尽的对比,分析原著与译作的文化差异,对比两个英译本翻译的策略和读者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内容、形式和文化上的互补性进行了论述。

结语对全篇进行了总结。本书从中西思维差异的视角,借助解构主义理论,以《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为例,解构了文化翻译策略在不同译本之间的差异,并分析其原因,但本书也指出该研究并不能涵盖文化翻译所有层面上的策略选择,而影响文化翻译的因素可以涉及很多方面。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促使译者发挥主动性,而翻译实践又能促使翻译策略具有多样性。

二、创新点

本书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① 将文化翻译置于中西思维差异的视野下进行研究,不仅研究译者主体在译语文化的作用,还研究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

② 将解构主义理论作为本书的理论支撑,将解构主义翻译观中的主体性、消解性和解释性等理论观点贯穿于整个研究。从文本、译者和读者的角度,分析译者的文化取向、译文的文化特征、读者的接受,扩展了在文化翻译中译者作为跨越和传送文化的主体的研究范围;

③ 本书采用宏观阐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上阐述解构主义对于文化翻译研究的启示,从微观上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文本分析,研究解构主义在文化翻译策略中的具体体现;

④ 在对文化翻译策略方法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以大量体现文化差异的《红楼梦》称谓语翻译为例,对文化翻译策略使用的多样性进行了研究,使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第一章 文化翻译与中西文化差异

“文化翻译”的概念最早是由人类学家埃得蒙·里奇在《我们自己与他者》一文中界定的(刘禾,2002)。所谓文化翻译,是指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研究翻译,即对各民族的文化以及语言的“表层”与“深层”结构的共性与个性进行研究,探讨文化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文化翻译观就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研究翻译。

20 世纪后半叶西方兴起的后现代批评理论与解构主义思潮的结合,对文学与翻译等学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解构主义思潮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语言罗格斯中心主义的破除,人们在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中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研究让位给了话语研究,让位给了文学文本和翻译文本产生过程的研究。(吕俊,2004:53)20 世纪 90 年代初,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1998 年,曾大力推进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两位学者巴斯耐特和勒弗菲尔在合著《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中又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这一观点。两个“转向”体现了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在文化中的位置。

第一节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文化”一词在西方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在中国的古籍中,“文”既指文字、文章,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是“教化”、“教行”的意思。“文化”一词的中西两个来源,都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精神现象,抑或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

《周礼》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关于“文化”二字的最早记录。汉朝刘向在《说苑·指武》中也提到了“文化”,他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冯天瑜,1991:13)这是中国人的“原始”文化观。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英国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

《辞海》对“文化”的定义是: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

从各种对“文化”的定义中可以得出结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囊括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文化。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具有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特性。

不同文化需要沟通,而沟通离不开翻译。因此,文化及其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翻译活动离不开文化。勒弗菲尔(1992)指出:“文学翻译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当两种语言发生碰撞时,他们是在两种文化传统的背景下进行的。”

“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现代汉语词典则将“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

奈达和泰伯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就是在接受语中复制(reproducing)”。纽马克(1982)认为:“翻译是一种技巧,它试图把用一种语言写成的书面信息或陈述替换为用另一种语言写成的相同的信息或陈述。”(Newmark, 2001: 7)卡特福德(Catford, 1965: 20)认为,“翻译”是“将用一种语言(即源语)写成的文本材料替换(replacement)成用另一种语言(即目的语)写成的对等的(equivalent)文本材料。”

王佐良先生曾经指出:“一个译者必须是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李绍年(1995: 65)曾说:“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亚于同语言的关系。……就翻译的实质来说,并非不同语言的转换,而是用不同语言对原作内涵文化的再现,是翻译与传播文化。”

王克非(1997)将“翻译”定义为:“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涵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

沈苏儒(1998: 156)也主张在“翻译”的定义中增加文化的内容,指出:“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翻译是把具有某一文化背景的发送者用某种语言(文字)所表述的内容尽可能充分地、有效地传达给使用另一种语言(文字)、具有另一种文化背景接受者。”

翻译的文化学派的领军人物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也指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她曾把语言比作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语言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包惠南, 2004: 9)文化转换是翻译的目的所在,在翻译中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转换

是肯定存在的。

翻译是传播文化的途径,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世界各主要文化系统的发展都和翻译活动脱离不了关系。”(包惠南,包昂,2004:4)“语言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传播和交流文化。”(包惠南,包昂,2004:9)翻译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移植。因此,在进行跨语言翻译时,要注意两种语言的文化因素,还要注意大的文化语境。

巴赫金指出,文化是有边界的,因此只有在其他文化参与的情况下,文化的自我意识才可能出现。文化参与的主要形式就是翻译,翻译的对象是作为文化一部分和文化符号的语言,这更证明了翻译的文化属性。翻译活动不仅意味着两种语言的相互作用,也意味着两种文化间的接触,人类对翻译这一文化现象的兴趣随着文明的发展和文化间对话的加深而不断增长。

人类的翻译实践证明翻译不只是语言的互动,也是文化的互动。翻译过程不仅跨越语言的界限,也跨越文化的界限,而翻译的文化研究更从理论角度证实了这个论断。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产生于文化交流的需要,它是文化交流得以进行的工具。翻译的结果又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译语和原语的文化都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节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随着国际人文学界“文化热”的兴起,翻译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掀起了文化研究的高潮。翻译的文化转向是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及文化学等学科兴起等因素合力的结果,文化转向实际上从罗伯特·拉多1957年出版的《跨文化语言学》就开始了。在这本关于比较语言学的著作中,作者不仅比较了语言特征,而且还涉及有关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特征。他指出,每一文化构成模式的定型行为都有它的形式、意义和分布,它们构成文化对比分析的三个层次,但三者并不孤立地存在。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在合作编写的《翻译、历史和文化》中正式提出了文化翻译。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的翻译也面临新的挑战。西方的后现代批评理论与解构主义思潮的结合,也对文学与翻译等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人文科学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相应地,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而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翻译转向。(石春让,2008a:81)

翻译的文化转向始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众多语言学理论,最有影响的当属奥斯丁(Austin)、索尔(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菲尔莫(Fillmore)的认知框架理论,韩礼德(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发展出的篇章语言学理论。这些理论都开始关注语言的社会交际层面,使语言学发生了语用转向,为翻译的文化转向提供了宝贵的学科环境。(石春让,2008b:82)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时期的理论流派主要有操纵学派、目的功能学派、译者行动论派和解构主义理论派等。操纵学派提供了文化转向的重要内容,目的功能学派发展了功能途径。操纵学派是文化转向的主流,对翻译学科范式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石春让,2008c:82)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一些翻译学者又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使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表现出跨学科性和全球性的特点。进入 21 世纪以来,更多翻译理论家继续从不同的视角探讨翻译的重要性,指出在跨文化和全球化语境下,翻译对促进文化交流至关重要。

人类对于文化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文化研究的大背景下,德里达、福柯等学者把研究领域扩大到翻译研究的范畴,他们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问题而强调翻译的重要性。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以翻译研究为中心,考察文化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而从翻译的角度研究文化,则是考察翻译在文化研究中的作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开拓传统翻译研究新的视野的同时,也对翻译提出了新的挑战。“文化”并非是无所不包的,翻译文化研究并不是翻译的全部,它只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曾文雄,2006:46)

第三节 文化翻译研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文化研究一直是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出现了许多流派。

翻译学学派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欧洲兴起,该学派沿用了近代翻译研究中的阐释方法,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该过程对译文及其文化发展、对原文及其文化延续的影响。近年来,该派从宏观的角度重视考察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功能翻译理论以德国的莱斯和诺德为代表。1971 年莱斯提出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她认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著中的原文及其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